
《文選》在中國與海外的 流傳與研究*

康達維 (David R. KNECHTGES)

華盛頓大學亞洲語言及文學系

陳竹茗譯

《文選》是中國現存最早按文體編纂的文學總集。本文首先探討《文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納史，尤其是唐宋時期的情況，關注初唐出現的文選學、唐代詩人對《文選》的興趣、《文選》早期的印刷史、「文選爛，秀才半」這一說法的起源，以及蘇軾對《文選》的苛評。第二部分關於《文選》在海外的接受史。此書在東亞其他國家，尤其在古代日本和韓國受到廣泛傳閱。早於八世紀，《文選》便流傳至日本，不少重要《文選》鈔本都保存在東瀛，其中以《文選集注》殘本最為重要，所收唐人評注大都於中土佚失。《文選》在朝鮮也有崇高地位，李氏朝鮮

* 本文內容曾於2014年3月27日香港浸會大學當代學術名家講壇上演講（網址：<http://hkbutube.lib.hkbu.edu.hk/st/display.php?bibno=b3655406>），講題原譯作「《文選》在中國境內與境外的傳承與傳統」，現由講者本人將講座內容整理發表。

王朝 (1392–1910) 曾命徐居正 (Sŏ Kŏjŏng, 1420–1488) 監修《東文選》(*Tongmunŏn*, 1478 年成書), 仿《文選》體例編纂朝鮮文學總集。本文最後一部分將簡述歐美文選學史, 特別是韋利 (Arthur Waley, 1889–1966), 贊克 (Erwin von Zach, 1872–1942) 和海陶璋 (James Robert Hightower, 1915–2006) 三人對《文選》的貢獻。

關鍵詞：《文選》 文選學 「文選爛，秀才半」
《文選集注》《東文選》 韋利 贊克
海陶璋

一、唐宋文選學的盛衰

《(昭明)文選》是中國現存最早按文體編纂的文學總集，亦是研究戰國時代至齊梁時期中國文學的重要文獻。這部選集是梁昭明太子蕭統(501-531)於520至530年間編纂，雖然從成書開始至南朝末年的流傳情況不明，但我們知道《文選》逃過梁末皇家藏書悉數焚燬的書厄，故得以著錄於《隋書·經籍志》。¹

據知最早為《文選》作注的文士亦為蘭陵蕭氏，即鄱陽王蕭恢(476-526)之孫蕭該(六世紀下半葉)，而蕭恢兄長蕭衍(464-549)即蕭統之父，²因此蕭該當為蕭統堂侄。屈守原認為蕭該年少在江陵時始習《文選》，其時已近梁末，³並說江陵所在的荊州有西府之稱，是人文薈萃之區。據此推測，《文選》編成後可能有鈔本在荊州府流傳。

蕭該曾參與《切韻》的編纂，並撰有《漢書音義》⁴及《文選音義》。後者雖已不存，但從書名可知此注重在音義訓釋。王重民(1903-1975)據稱從敦煌遺書中發現《文

1 《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卷四一，頁1082。

2 同上注，卷七五，頁1715-1716。蕭該生平及學術，見汪習波：《隋唐文選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3-50；王書才：蕭該生平及其《文選》研究考述，《安康師專學報》，2005年2期，頁66-68及84。

3 屈守元：《文選導讀》(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頁46。

4 《隋書》卷三三，頁953。蕭該參與編修《切韻》的情形，見Göran Malmqvist 馬悅然，“Chou Tsu-mo on the *Ch'ieh-yün*”(周祖謨論《切韻》),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40 (1968): 33-78.

選音義》殘卷，⁵但這個說法已被周祖謨（1914–1995）推翻。⁶然而從《文選》李善注所引，尚可輯出一些佚文。⁷

真正意義的文選學形成於隋唐之際，幕後功臣是在揚州講授《文選》的學士曹憲（605–649年在世）。⁸曹憲亦著有《文選音義》，為文中單字作音訓疏釋，但與其《爾雅音義》俱佚。⁹

5 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322–323。

6 周祖謨：《論文選音殘卷之作者及其音反》，《輔仁學志》第8卷第1期（1939年），頁113–125；經修訂為《論文選音殘卷之作者及其方音》，載氏著：《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上冊，頁177–191；另收入俞紹初、許逸民主編：《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45–58。敦煌唐寫本《文選音》原件複印圖版，見饒宗頤編：《敦煌吐魯番本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01–111。

7 如張衡《思玄賦》「行頗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下李注云：「頗，傾也。離，遭也。殃，咎也。蕭該音本作陂，布義切。」見《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十五，頁654。

8 劉肅（806–820在世）《大唐新語》云：「江淮（長江、淮河下游）間為《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見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九，頁133。另參《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一八九上，頁4945–4946；《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一九八，頁5640。曹憲生平簡述，見王書才：《曹憲生平及其《文選》學考述》，《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4期，頁124–126。有關唐代揚州文選學史，見諸祖煜：《唐代揚州的《文選》學》，《揚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1期，頁131–134。

9 《舊唐書·經籍志》未著錄《文選音義》，《新唐書·藝文志》則云已亡，見《新唐書》，卷五七，頁1622。

雖然曹憲的《文選音義》不存，隨他學習《文選》的弟子不少各自名家，並有著述留存後世。據《舊唐書》，曹門高足有許淹、李善（627-690）和公孫羅（661年在世），¹⁰《新唐書》則加上魏模。¹¹我們對魏模的選學著作所知甚少，但前三人的著述大體可考。

許淹，潤州句容（今江蘇句容市）人，少時一度出家為僧，後還俗，專心治學；以博物洽聞見稱，尤精詁訓，¹²撰有《文選音》十卷。¹³敦煌遺書中發現《文選音》唐寫本殘卷，有指為許淹所著，¹⁴但有學者持異議。¹⁵

據《舊唐書·儒學傳》，公孫羅祖籍江都（今揚州），¹⁶但《大唐新語》則云江夏（今河北武漢市）。¹⁷所著《文選音（義）》十卷及所注《文選》六十卷見於兩唐書經籍志及藝文志；¹⁸另有著作流傳至日本，如所撰《文選

10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頁 4946。

11 《新唐書》，卷一九八，頁 5640。

12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頁 4946；《新唐書》，卷一九八，頁 5640。另見屈守元：《文選導讀》，頁 62-63。

13 《舊唐書》，卷四七，頁 2077；《新唐書》，卷六，頁 1619 及 1622。

14 參見注 6。

15 如范志新：《唐寫本《文選音》作者問題之我見——文選學著作考（一）》，《晉陽學刊》2005 年 5 期，頁 125-126。

16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頁 4946。

17 《大唐新語》，卷九，頁 134。

18 《舊唐書》，卷四七，頁 2077；《新唐書》，卷六，頁 1621。有關公孫羅的著述，另見屈守元：《文選導讀》，頁 63-66；王書才：《論公孫羅《文選鈔》的價值與闕失》，《中州學刊》2005 年 3 期，頁 220-222。

音訣》十卷及《文選鈔》六十九卷俱著錄於藤原佐世（898年卒）《日本國見在書目錄》。¹⁹ 現存日本的唐寫本《文選集注》屢引《文選鈔》，應即為公孫羅所著。²⁰

曹憲弟子中聲譽最隆的首推李善。²¹ 李善，字次孫，生於揚州江都，曹憲多年來在此地講授《文選》。李善先後在李弘（651–675，唐高宗第六子，顯慶元年〔656〕策立為太子）及李賢（約 653–684，先後於 655 及 661 年封潞王及沛王）門下任事，為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及潞王府記室參軍。大約在咸亨二年（671）坐事流配至嶺南姚州（府治在姚城，今雲南姚安縣以北），674 年遇赦北還，寓居於汴州（今開封市）、鄭州（今河南滎陽市）一帶講授《文選》，載初元年（689 年十一月至 690 年八月）卒。²²

李善給《文選》所作的注成為本書的標準注本，李善注研究亦成了文選學的主要課題。另外，李善作注時亦重定了《文選》的篇次。《文選》原有三十卷，李善注本則有六十卷。他在顯慶三年（658）向高宗（649–683 年在

19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光緒十年〔1884〕《古逸叢書》刊本），頁 45。

20 相關考證詳見森野繁夫：《文選集注所引「鈔」について》，《日本中 報》第 29 集（1977 年），頁 91–105；長谷川滋成：「文選鈔」の引書，《日本中 報》第 32 集（1980 年），頁 155–167；富永一登：「文選集注」所引「鈔」の撰者について：東野治之氏に答う，《中 研究集刊》第 7 號（1989 年），頁 15–20。

21 李善生平，詳見屈守元：《文選導讀》，頁 52–61；饒宗頤：《唐代文選學略述》，《敦煌吐魯番本文選》，頁 9–12；汪習波：《隋唐文選學研究》，頁 59–69。

22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頁 4946；《新唐書》，卷一二七，頁 5754。

位)進呈《文選注》。

李善注可謂理解《文選》篇章字詞最重要和最有用的工具,除解釋字音字義、為詞語用法提供書證、標明典故出處外,亦引用大量文獻補充作品的背景資料,其中不少所引的書目現已亡佚。

李善早於顯慶三年(658)進表呈上六十卷《文選注》,不過顯然續有修訂,有證據顯示他至少五易其稿。²³現存最早的李善注鈔本是張衡(78-139)西京賦寫卷(《文選》李注卷二),卷末題記為「永隆年(681)二月十九日弘濟寺寫」,按弘濟寺在唐長安,其時李善尚在世。²⁴寫卷後來從長安輾轉流落至敦煌,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編號為P. 2528,見圖1。²⁵

23 李匡乂:《資暇集》(《四庫全書》本),卷上,頁7b。另參王謙(1101-1110年在世)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二,頁168。

24 季愛民:《隋唐兩京寺觀叢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1年2期,頁100-101。有關該寫卷的研究,見劉師培:《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文選李注卷第二殘卷》,《國粹學報·通論》第77期(1911年),頁6a-11b;饒宗頤:《敦煌本文選斟證》,《新亞學報》3卷1期(1957),頁333-403;伏俊連:《敦煌賦校注》(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頁1-97;羅國威:《敦煌本《昭明文選》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1-117;傅剛:《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240-249。

25 圖片轉載自國際敦煌項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檢視日期:2017年7月31日。網址:http://idp.bl.uk/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43079295010;recnum=59634,特此鳴謝。

李善注雖然善之又善，但部分唐代學者認為未如人意，尤其是發明章句、轉述大意的地方不足。開元六年（718），工部侍郎呂延祚將新集《文選》注本呈上玄宗，剛好是李善向高宗獻書後一個甲子。集注本包含以下五人的注釋：

1. 衢州常山縣尉呂延濟
2. 都水使者劉承祖之子劉良
3. 處士張銑
4. 處士呂向
5. 處士李周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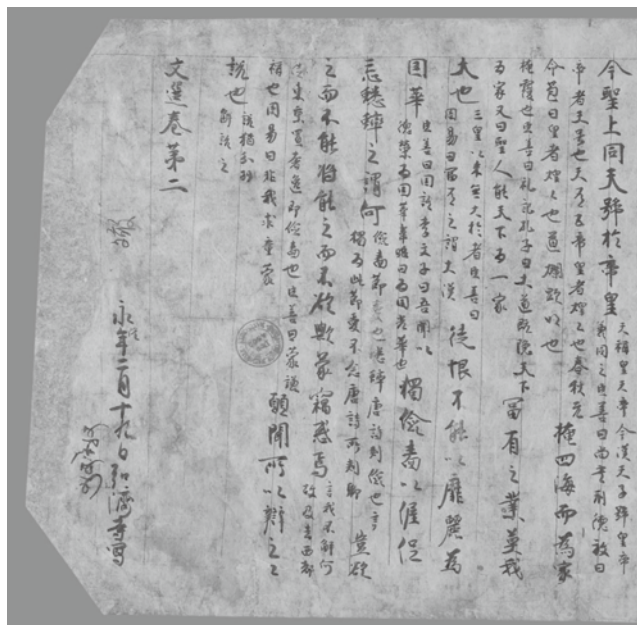


圖 1 尾題為「永隆二年二月十九日弘濟寺寫」，按永隆年號為時甚短，只於 680 至 681 年使用，因此本卷鈔畢之日應為公元 681 年 3 月 17 日。

是謂「五臣注」，其中知名於世者僅呂向一人。呂向早年與房琯（697-763）隱居於洛陽附近的陸渾山，自五臣注進上後頗為顯貴，開元十年（722）召入翰林院，兼集賢院校理。²⁶ 呂延祚則是開元初年的重要人物，開元三年（715）參與草擬《開元格》。²⁷

呂延祚向玄宗呈上《五臣注文選》三十卷時附有進表，但這篇進集注文選表大有可能出自呂向手筆。文中對李善的批評毫不留情：

往有李善，時謂宿儒，推而傳之，成六十卷。忽發章句，是徵載籍，述作之由，何嘗措翰。使復精覈注引，則陷於末學，質訪指趣，則巋然舊文。祇謂攬心，胡為析理。²⁸

玄宗宣口敕云：

比見注本，唯只引事，不說意義。

所謂注本自然指李善注本。玄宗隨後敕令呂延祚領取賜絹，可以推想此書已入內廷書庫。

²⁶ 《新唐書》，卷二二，頁 5758。

²⁷ 《舊唐書》，卷五，頁 2150。

²⁸ 《六臣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 1。

及至晚唐時期，五臣注頗受抨擊，最著名者為「非五臣」。作者李匡文（又作匡乂，普遍以匡文為是；九世紀後半在世）是李唐宗室成員，著有筆記《資暇集》，²⁹內收「非五臣」一文，饒富趣味，值得作詳盡研究。李匡文除了批駁五臣注外，亦留下李善獻書朝廷後，四番修訂其《文選》注釋的重要記載。

在研究隋唐文選學的著作中，以復旦大學中文系汪習波博士的近著最精闢。³⁰汪博士年紀雖輕，但有不少新見解。

五臣注雖然被李匡文嚴厲批評，但直至十一、十二世紀以前，仍然較李善注廣為流通和閱讀。《五臣注文選》很早便有刻本，現知最早的版本是五代時期四川刊本。³¹五臣單注本《文選》頗為稀覯，其中臺灣中央圖書館收藏一部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陳八郎刻本，建陽（今福建）崇化書坊刊行。此一版本通稱陳八郎本，收藏單位曾出版影印本。

在唐代，《文選》成為應考進士科的重要讀本。士子需要掌握《文選》作品的內容並模仿其風格，方能在科舉考試中出類拔萃，故杜甫叮囑幼子宗武「熟精《文選》

29 李匡文的仕履見張固也：《資暇集》作者李匡文的仕履與著述，《文獻》2000年4期，頁101-105。

30 汪習波《隋唐文選學研究》，316頁。

31 見陶岳《五代史補》，轉引自王明清（1127-約1215）：《揮塵錄餘話》（《四庫全書》本），卷二，頁21a-b。

理」。³² 雖然《文選》不是直接考試的內容，但有史料顯示該書是士子準備應舉時的主要參考書。李德裕（787-849）對科舉考試深表不滿，據載曾對武宗（840-846年在位）直言祖父李栖筠（719-776）在天寶（742-755）末年應舉是逼於無奈，「以仕進無他岐」；雖然一舉登第，但認為所考無關實學，對這種進身之階大為不屑，因此勸子弟絕意科場，並且「自後家不置《文選》」。³³

從另一條史料可見，《文選》在唐代流傳之廣已至於西域。唐中宗宗女金城公主（741年卒）因和親吐蕃，嫁予贊普赤德祖贊（綽號梅阿迴，712-755年在位），開元十八年（730）曾遣吐蕃使者向唐朝廷奏請「《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³⁴

當時俗文學中亦有提及《文選》。敦煌遺書中有一篇秋胡變文，講述秋胡離家求取功名的故事。他「辭妻了道，服得十袂文書，並是《孝經》、《論語》、《尚書》、《左傳》、《公羊》、《穀梁》、《毛詩》、《禮記》、《莊子》、《文選》，便即登程（程）。」³⁵ 在他帶走的十本書中，只有《文選》和《莊子》不屬於儒家典籍，由此可見士子備試時除了溫習經傳，亦會鑽研《文選》。

32 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一九，頁1478。

33 《新唐書》，卷四四，頁1169；另參《舊唐書》，卷十八上，頁603。譯者按：「他岐」，《舊唐書》作「他伎」。

34 《舊唐書》，卷一九六，頁5232。

35 項楚：《敦煌變文選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上冊，頁369。

《文選》在宋初仍然為人廣泛閱讀，但及至熙寧（1068–1077）、元豐（1078–1085）年間，這部選集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前。導致「文選之衰落」的主因包括，歐陽修（1007–1072）帶領革新科舉制度，並於嘉祐二年（1057）知貢舉時以古文取士，凡作「太學體」文章一概黜落不取，其後王安石（1021–1086）實行熙寧變法，進一步推波助瀾。³⁶ 談到文選學在宋代衰落時，學者往往引陸游（1122–1210）《老學庵筆記》的這一條記載：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引者按：其時歐陽修已扭轉風氣，以古文取士），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³⁷

值得注意的是，從此文可看出陸游對《文選》並未精熟。所提及的四個詞中只有「王孫」、「望舒」和「清暉」可在《文選》裡找到，其中「王孫」一詞見於 招隱士 ，

³⁶ 郭寶軍：《宋代文選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頁271–282。

³⁷ 陸游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八，頁100。相似的記載亦見於王應麟（1223–1296）著，翁元圻等注，欒保群、田松青、呂宗力校點：《困學紀聞（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卷十七，頁1860–1861。

但原意是隱士，並非草的借代詞。至於借代為梅的「驛使」根本不見《文選》，據我所知這個用法最早見於盛弘之（437年在世）的《荊州記》，所引陸凱（五世紀）贈范曄（398–466）詩中有「折梅逢驛使」句。³⁸

「文選爛，秀才半」的說法其實早已有之，甚至可能是唐人的習語，說明《文選》在當時地位崇高。如佚名作《雪浪齋日記》³⁹應早於陸游《老學庵筆記》，曾言道：

昔人有言：《文選》爛，秀才半。正為《文選》中事多，可作本領爾。余謂欲知文章之要，當熟看《文選》，蓋《選》中自三代涉戰國、秦、漢、晉、魏、六朝以來文字皆有。⁴⁰

此文作者既說「昔人有言」，可見這句話流傳已久，或許唐朝時已有。

宋代對《文選》批評最苛刻的是蘇軾（1037–1101）。他從多方面指撻此書，具體內容這裡無暇贅述，不過我希望有人能深入研究蘇軾對《文選》的評語，將可以寫成一篇文章。此處只引他最有名的一段議論：

38 《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十九，頁5a（95）及卷四九，頁4a（1888）。

39 屈守元《文選導讀》，頁90–91。

40 轉引自何汶撰，常振國、絳雲點校：《竹莊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一，頁7。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為卑弱。〈文選序〉斯可見矣。如李陵書、蘇武五言皆偽，而不能辨。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閒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⁴¹

蘇軾此跋作於元豐七年（1084），其時身在江西。文中首先指斥蕭統收入託名李陵和蘇武所撰的書信和五言詩，認為他真偽不辨，接著說所收陶詩太少，最後更指陶淵明閒情賦未收實為識見庸下。

有關 李少卿與蘇武 及 蘇子卿詩，雖然現代學者大都認為是託名之作，但在蕭統之時普遍認為出自李陵和蘇武手筆，沒有收進歷代文選反而讓人意外。

至於蘇軾對蕭統不多收陶潛作品的微言，著實耐人尋味，要知昭明太子是齊梁時期極力推許陶淵明的文人之

一，⁴² 更為他編過文集。假如沒有蕭統刻意收集和編集，

41 蘇軾：《東坡志林》（《四庫全書》本），卷一，頁3b。

42 蕭統對陶淵明的看法，可參 Wendy Swartz 田菱，*Reading Tao Yuanming: Shifting Paradigms of Historical Reception (427-19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111-15（中譯本見田菱著，張月譯：《閱讀陶淵明》〔臺北：聯經出版，2014年〕，頁202-207）；Wang Ping 王平，*The Age of Courtly Writing: Wen xuan Compiler Xiao Tong (501-531) and His Circle* (Leiden: Brill, 2012), 261-77。

陶氏的詩文很可能無法傳至宋代，讓蘇軾得以飽讀。蕭統唯獨不滿意陶淵明的《閒情賦》，稱之為「白璧微瑕」。蘇軾則認為此賦「好色而不淫」，若論淫則斷不會過於《文選》所收的屈、宋文章，尤其是宋玉的賦。

每次讀到蘇軾的這番話，篇首「舟中讀《文選》」一句總令我莞爾不已。從此文可見，他外出時可能隨身帶備一部《文選》，但我百思不得其解，既然東坡認為此書如此不堪，為甚麼要置之行篋？

雖然蘇軾等學者給予的評價不高，但從《文選》的刊刻史可見，宋人對此書的需求甚殷。

最早刊刻的李善注《文選》當是北宋初年三館秘閣所雕印者，具體時間在景德四年（1007）至大中祥符四年（1011）之間。⁴³此選本與《文苑英華》同時刻板，但大中祥符八年（1015）宮城失火，二書盡燬。新刊本於天聖（1023-1032）初年草就，天聖三年（1025）校勘了畢，天聖七年（1029）完成雕版，並於天聖九年（1031）進呈印本，是謂國子監本，⁴⁴又稱天聖明道本。按天聖之後是明道（1032-1034），這個年號只用了兩年，可見部分版面曾於明道年間重新刷印。

完整的北宋國子監本今已不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廿一卷，臺北故宮博物院則藏十一卷，似乎原來出自同一部書。國圖本存14冊，計有卷十七至十九、三十至三一、三六至三八、四六至四七、四九至五八及六；故宮本存

43 傅剛：《文選版本研究》，頁151-152。

44 有關北宋國子監本，詳見傅剛：《文選版本研究》，頁157-159。

4 冊，計有卷一至六、八至十一及十六。

宋代最有名的李善注本，當數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1127–1194）於池陽（安徽貴池的古名）郡齋所刻本。尤刻本向被目為未經五臣注所亂、最早的李善注本，但近年研究指出尤刻本並未如實反映李善注原貌，多有為五臣注本竄亂的痕跡。⁴⁵ 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淳熙尤刻本初刻已收入館方出版社編纂的《中華再造善本》叢書，以高仿真原貌彩印。⁴⁶

另一部重要的宋刻《文選》是上文提及的陳八郎本。

《文選》在元明兩代繼續為人刊刻及研讀，這亦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課題，當然清人的文選學著作亦應加以重視和研究。作為經驗之談，我只能說但凡有志投身文選學的學子都有必要參考清代學者的選學研究。王書才近年出版了一本詳盡梳理明清文選學史的著作，⁴⁷ 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郝倖仔亦於 2012 年完成有關明代文選學的博士

45 尤刻本李善注《文選》的研究，分別見張月雲：《宋刊〈文選〉李善單注本考》，《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頁 793–808；傅剛：《〈文選〉版本研究》，頁 160–167；常思春：《尤刻本李善注〈文選〉闖入五臣注的緣由及尤刻本的來歷探索》，《〈文選〉與「文選學」——第五屆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頁 640–660；范志新：《李善注〈文選〉尤刻本傳承考辨》，《文選版本論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35–66。

46 《文選》（《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集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年），全 14 冊。

47 王書才：《明清文選學述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272 頁。

論文。⁴⁸ 由於這個課題實在太大，這裡無法用三言兩語交代，因此相關內容請參考王書才的專著。

二、《文選》在古代日韓的流播和日本近當代「文選學」研究

《文選》不單早已成為中國的重要典籍，在鄰近東亞國家亦廣受閱讀，日本和韓國尤其如此。《文選》很早就傳至東瀛，據延曆十六年（797）以漢文體寫成的御修國史《續日本紀》所載，聖武天皇天平七年（735）唐人袁晉卿隨日本使節至東土，時年十八、九歲，因習得《文選》、《爾雅》兩書的正音，於光仁天皇寶龜九年（778）官拜「大學（寮）音博士」。⁴⁹ 可見當時《文選》已為日人所重視。

《文選》在日本文學傳統裡頗為知名，清少納言（約966–1017）的《枕草子》（又名《枕冊子》）和吉田兼好（約1283–約1350）《徒然草》兩部名著都提及這部選集。首先是三卷本《枕草子》：

48 郝倅仔：《明代 文選 學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年），136頁。

49 菅野 道等撰：《續日本紀》（《新訂增補 史大系》第2卷）（東京：弘文館，1935年初版；東京：吉川弘文館，1979年再版），卷三五，頁446，「 九年十二月庚寅」條。

文は 文集。文選。新賦。⁵⁰ 史記五帝本

50 「新賦」一詞向來為多數注家和譯者所不解。常見的說法是，新賦指《文選》所收的六朝賦，換言之應與上詞連讀，作「《文選》新賦」解，說見松尾聰、永井和子校注並合譯：《枕草子》（《新編日本古典文 全集》第18卷）（東京：小學館，1997年），頁336。六朝後期確實出現一種新賦，即通常所說的駢賦，不過《文選》收錄庾信（513–581）等大家所作的駢賦名篇屈指可數，故此說未能令我信服。張培華近來提出，新賦應指唐代新出現的賦體「律賦」，見氏著：『枕草子』における漢文 受容の可能性（神奈川 三浦郡葉山町：合研究大 院大 博士論文，2012年），頁236–260；另見張培華：『枕草子』における「新賦」の新解，《古代中世文 論考》第16集（2005年），頁189–205。她提供的一條有力證據是，新賦一詞見於唐代賦格類著作《賦譜》（按此書寫成於中唐、甚至晚唐，只有一個平安時代中期〔約十一世紀〕鈔本傳世，現藏東京五島美術館，為日本國指定重要文化財）。《賦譜》有一段談論「古賦」與「新賦」之別，後者無疑指律賦。見詹杭倫：《賦譜》校注，載詹杭倫、李立信、廖國棟合著：《唐宋賦學新探》（臺北：萬卷樓圖書，2005年），頁78注3。詹教授指出：「《賦譜》所謂之『新體』、『新賦』，均指律賦而言。『律賦』唐人稱為『新賦』或『甲賦』。五代以後，始以『律賦』相稱。」雖然弄清新賦的意思，接下來的問題是新賦究竟是一本選集的書名，還是清少納言愛讀的賦體文類？答案可在藤原通憲（法名西信，1106–1160）的私家書目覓得，其中第百十六櫃收入《新賦 抄》一卷；見《通憲入道藏書目錄》，載塙保己一編纂：《群書類從》（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54年訂正三版），第28輯「雜部」，卷四九五，頁198。在中國，「抄」用作書名時指某書的節鈔或選本，因此《新賦 抄》很可能是《新賦》一書的節鈔本，與《文選》並列。在此鳴謝華盛頓大學同事 Paul Atkins、Ted Mack 及門生魏寧（Nicholas M. Williams）的幫助，讓「新賦」之謎得以解開。

紀。願文。表。博士の申文。⁵¹

（漢文）書卷，首推《（白氏）文集》、《文選》、《新賦》、《史記·五帝本紀》、發願文、表、文章博士代筆的申文（求遷進表）。⁵²

接著是《徒然草》：

一人、燈のもとに文をひろげて、見ぬ世の人を友とするぞ、こよなう慰むわぎなる。文は、文選のあはれなる卷々、白氏文集、老子のことば、南華の篇。この国の博士どもの書ける物も、いにしへのは、あはれなること多かり。⁵³

燈下獨自披卷展讀，尚友古人，甚足以慰吾情。書卷云云，首推《文選》中哀感頑艷之卷、《白氏文集》、老子之言、南華諸篇。我國文章博士著述中，往昔之作亦頗多感人至深者。⁵⁴

51 田中重太郎：《枕冊子全注釈》（東京：角川書店，1972-73年），卷四，頁69-70（第193段）。

52 譯者注：另參周作人譯：《枕草子》，收入《日本古代隨筆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223（第173段）；及林文月譯：《枕草子》（臺北：洪範書店，2000年），頁220（第193段）。按周、林譯文所用底本為通行的能因本，沒有「新賦。史記五帝本紀。願文。表」四種。

53 安良岡康作：《徒然草全注釈》（東京：角川書店，1967年），上卷，頁69（第13段）。

54 譯者注：譯文參考了王以鑄譯：《徒然草》，收入《日本古代隨筆選》，頁342-343（第13段）。

日本國內保存了不少《文選》手鈔本，當中最重要的是《文選集注》(*Monzen shūchū*)。原書百二十卷，僅有廿四卷左右流傳至今，分散在國內外不同地方保存。⁵⁵ 民國初年，羅振玉(1866–1940)以珂羅版影印、摹寫其中十六卷；⁵⁶ 1935 至 1942 年，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以《舊鈔本文選集注殘卷》之書名影印出版廿三卷；⁵⁷ 200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南京大學周勛初教授的纂輯本，除與上述印本重複的部分，更蒐羅全部已知的殘卷和殘葉。⁵⁸

學界對《文選集注》的鈔寫年代和流傳嬗遞尚未有共識。1971 年，臺灣學者邱榮錫發現卷六八蓋有「荊州田氏藏書之印」、「田偉後裔」等多方篆文藏印，斷定此書原為宋代荊州著名藏書家田偉(十一世紀) 舊藏，故必然在中土寫定。⁵⁹ 不過後來經學者考定，卷首兩頁的田氏藏印並非屬於田偉，而是祖籍江陵、自稱田偉後裔的田潛(1870–1926)。此人本名田吳炤(字伏侯，號潛山，故又

55 有關《文選集注》存佚情況及流傳史，見橫山弘：《舊鈔本《文選集注》傳存(流傳) 概略》，載趙福海、劉琦、吳曉峰主編：《昭明文選與中國傳統文化——第四屆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 年)，頁 123–125。

56 羅振玉輯印：《唐寫文選集注殘本》(《嘉草軒叢書》本，1918 年)，全 16 冊。

57 《文選集注》(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第 3–9 集) (京都：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1935–1942)，全 27 冊。

58 周勳初纂輯：《唐鈔文選集注彙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全 3 冊。

59 見 今存日本之《文選集注》殘卷為中土唐寫卷舊藏本，《中央日報》(臺北)，1974 年 10 月 30 日，第 10 版。

名潛)，1902至1905年遊學日本，其間購得《文選集注》數卷，故此難以定奪此本最初鈔成於中國還是日本。⁶⁰

周勛初認為《文選集注》是唐代著作，所舉的證據之一一是此書只避唐朝首兩位皇帝李淵（高祖）和李世民（太宗）帝諱，但李顯（中宗）和李隆基（玄宗）的名諱不缺筆，且不避宋諱。另外，一些字的寫法亦符合唐人書寫習慣，如「閉」寫成「閉」、「惡」寫作「惡」等。因此，周教授的結論是此書成於中唐時期。這篇考證文章作為前言，冠於2000年上海古籍影印本《文選集注》廿四卷書前。

不過，范志新教授反駁周勛初所舉的避諱字和唐人鈔寫習慣，認為《文選集注》傳本是日本平安時代（794–1185）寫成的鈔本。⁶¹ 廣島大學副教授陳翀新近提出，此書編纂者是平安時代詩人、學者大江匡衡（952–1002）。⁶²

《文選集注》的價值在於保存了李善和五臣注以外的唐人注釋，如《文選鈔》和《音決》二書或出自公孫羅之手。此外，陸善經舊注亦非常可貴。

60 周勛初：《文選集注》上的印章考，載《昭明文選與中國傳統文化》，頁126–130。

61 范志新：關於《文選集注》編纂流傳若干問題的思考，《文選版本論稿》，頁245–256。

62 陳翀：『集注文選』の成立過程について——平安の史料を手掛かりとして，《中文論集》第38號（2009年），頁49–61；陳翀：《文選集注》之編者及其成書年代考，載趙昌智、顧農主編：《第八屆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揚州：廣陵書社，2010年），頁121–126。

陸善經出身吳郡（今蘇州）陸氏，是一位飽學之士，開元中經蕭嵩（749年卒）薦入集賢院為直學士，預修《開元新禮》；開元二十二年（734）起奉命注《月令》，其後參修《唐六典》，並注《孟子》七卷。⁶³

蕭嵩是蕭統七世孫，開元十七年（729）任中書令期間兼知集賢院事，「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 佐李玄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但最終「功竟不就」。⁶⁴ 據韋述《集賢注記》（765）所載，「先是馮光震奉敕入院校《文選》，上疏以李善舊注不精，請改注，從之，光震自注得數卷。」隨後蕭嵩於開元十九年（731）三月奏請以王智明三人助之，明年五月陸善經受命與王、李專注《文選》。⁶⁵ 雖然事竟不就，但陸善經可能一個人繼續作注。

陸善經注僅見於《文選集注》古鈔本，我認為其中頗多有用資料，以及不同於李善和五臣的獨到見解。雖有不少中國和日本學者予以簡短評介，但作深入系統研究者尚乏其人。有魄力的學者若能承擔這個課題，必將有所

63 陸善經生平及學術，見新美寬：陸善經の事跡に就いて，《支那學》第9卷第1號（1937年），頁131-148；向宗魯：書陸善經事——題《文選集注》後，《斯文半月刊》第3卷第2期（1943年），頁14，另收入《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頁72-74；藤井守：文選集注に見える陸善經注について，《島大文部紀要》第37卷（1977年），頁287-301。

64 劉肅：《大唐新語》，卷九，頁134。

65 轉引自《玉海》（《四庫全書》本），卷五四，頁9b-10a。

斬獲。⁶⁶

《文選》在古代韓國也十分重要。不過由於本人不諳韓文，所以不願在這方面信口開河。我的相關知識主要來自學生鄭旭真（Jeong Wook-jin），他的博士論文便嘗試梳理《文選》在韓國的接受史。話說回來，我們知道《文選》至遲在唐代已傳至韓國。據《舊唐書·東夷·高麗傳》記載，高句麗的民間學堂「肩堂」多收經史典籍，「又有《文選》，尤愛重之」。⁶⁷新羅統一三國（高句麗、百濟和新羅）後，神文王二年（682年）仿唐制設置國家最高教育機關「國學」，課程包括五經和《文選》。元聖王四年（788年）仿照唐朝明經科，始設「讀書三品科」考試制度，「諸生讀書，以三品出身，讀《春秋左氏傳》、若《禮記》、若《文選》，而能通其義，兼明《論語》、《孝經》者為上（品）」。⁶⁸《文選》一書在朝鮮半島向來地位崇高，直至李氏朝鮮王朝（1392–1910）代興，該國學者才開始對古文抱有濃厚興趣。不過，朝鮮的《文選》——《東文選》（*Tongmunsŏn*）——正是此一時期成書。是書為徐居正（Sŏ Kŏjŏng，字剛中，1420–1488）奉敕纂集，成宗九

66 目前為止最詳盡的研究為佐藤利行：『文選集注本』離騷經一首所引陸善經注について，連載於《島大文部紀要》第58卷（1998年），頁102–121，第59卷（1999年），頁62–76，及第60卷（2000年），頁133–152。

67 《舊唐書》卷一九九上，頁5320。

68 金富軾（1075–1151）著，李丙燾校譯：《三國史記》（漢城：乙酉文化社，1984年），第2冊《原文篇》，卷三十八「雜誌第七（職官上）」，頁366–367。

年（1478）成書，收錄新羅至李朝肅宗時期的漢文文學作品，並仿《文選》體裁按文類編排。⁶⁹

《文選》亦曾在朝鮮刊刻，韓國當地保存了許多重要的版本。⁷⁰ 這裡暫舉一例，即韓國漢城大學奎章閣藏古活字本六家注《文選》，世宗十年（1428）刊行，底本是北宋元祐九年（1094）刻印的秀州（今浙江嘉興）州學本。秀州本是最早將五臣注與李善注合刻的六家注本，其中五臣注部分採用天聖四年（1026）平昌（今山東安丘）孟氏刊本，比陳八郎本足足早一百多年；李善注部分則以天聖七年（1029）國子監重刻本為底本。

及至二十世紀，日本學者對《文選》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在版本和古寫本方面的成果尤其突出，此中的佼佼者首推斯波六郎（Shiba Rokurō, 1894–1959）。他在1942

69 《東文選》的中文研究著作，見陳彝秋：徐居正與《東文選》，《古典文學知識》2008年6期，頁78–87；陳彝秋：朝鮮《東文選》詩體分類與編排溯源，《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s2008年4期，頁133–138；陳彝秋：論中國賦學的東傳——以《東文選》辭賦的分類與編排為中心，《南京社會科學》2010年3期，頁144–150；陳彝秋：論中國選本對朝鮮《東文選》文體分類與編排的影響，《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3期，頁133–137。

70 參見金學主著，豐福健二日譯：李朝刊『五臣注文選』について，《中世文學研究》第24號（1993年），頁45–63；鄭玉順：現存韓國刊行《文選》版本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8年4–5期，頁86–93；磯部彰：朝鮮版五臣注『文選』の研究，《東北アジアアラカルト》第17號（2006年），頁1–50。

年於京都帝國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師從著名漢學家狩野直喜（Kanō Naoki, 1868–1947），狩野本人即在1929年發表有關《文選》唐鈔本的論文。⁷¹ 斯波教授在返回京大讀博士前曾執教於廣島多所學院，其中在廣島大學（包括其前身之一廣島文理科學大學）任教的時間最長。1930年代，斯波教授已發表《文選集注》系列論文，不少他的學生也鑽研這本選集，對諸注家的研究頗有創獲。然而，真正令斯波教授蜚聲學林的是其《文選》版本史長篇研究。他在1959年發表百多頁的《文選諸本の研究》，作為所編《文選索引》前言。⁷² 此文在2000年傅剛的專著出版前，一直是《文選》版本史的典範之作。

廣島大學歷來是《文選》研究的重鎮，斯波教授的高足小尾郊一（Obi Kōichi, 1913–2010）便曾任教此校。小

71 狩野直喜：《唐鈔本文選殘篇跋》，《支那學》第5卷第1號（1929年），頁153–159，經童嶺整理後收入《古典文獻研究》第十四輯「《文選》學專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頁145–151。

72 斯波六郎：《文選諸本の研究》（廣島：斯波博士退官記念事業會，1957年），105頁；收入氏編：《文選索引》（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7–59年，全4冊），第1冊，頁3–105。中譯本有三種，分別見斯波六郎撰，李慶譯：《文選諸本研究》，載斯波六郎編，李慶譯：《文選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全3冊），頁5–141；戴燕譯：《對《文選》各種版本的研究》，載《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頁849–961；及黃錦銓、陳淑女譯：《文選諸本之研究》（臺北：法嚴出版社，2003年），14–209頁。

尾教授詳論六朝自然觀的專著固然最為人所熟悉，⁷³ 但他的《文選》研究也很有份量。1966年起，他與廣島大學師生開始全面研究李善注所引書，成果體現為1990及1992年出版的兩大本著作，⁷⁴ 是迄今為止對李注引書最詳盡的考證。

小尾教授亦曾撰文探討《文選》的各個方面，包括蕭統序、李善注、《文選》在中日兩國的傳播，以及就嵇康（223–262）養生論、李康（約190–約240）運命論和劉峻（462–521）辨命論作單篇析論。這些論文於2001年結集成《沈思與翰藻：文選研究》。⁷⁵ 另外，小尾教授是《文選》現代日語全譯本的譯者之一。⁷⁶

另一位著作等身的文選學專家是岡村繁（Okamura Shigeru, 1922–2014）。中文讀者對這個名字並不陌生，因為他的著作大都譯成中文出版，包括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十卷本《岡村繁全集》。岡村教授亦是斯波六郎的高足，福岡市九州大學榮休教授。1960年代開始發表文選學系

73 小尾郊一：《中國文學に現われた自然と自然觀——中世文學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岩波書店，1962年），629頁；中譯本見邵毅平譯：《中國文學中所表現的自然與自然觀：以魏晉南北朝文學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364頁。

74 小尾郊一、富永一登、衣川賢次：《文選李善注引書攷證》（東京：研文出版，1990–92年），全2冊。

75 小尾郊一：《沈思と翰藻：「文選」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2001年），286頁。

76 小尾郊一、花房英樹譯：《文選》（《全釈漢文大系》第26–32冊，全7冊）（東京：集英社，1974–76年）。

列論文，大都收入 1999 年出版的文選研究專著，⁷⁷ 並於 2002 年出版該書中譯本。⁷⁸

岡村教授其中一項重要成果，是對東京永青文庫藏敦煌本《文選注》的研究。這個初唐寫卷塵封書庫多年，直至 1965 年方由永青文庫複印製版印行。⁷⁹

寫卷內含《文選》卷四十其中五篇作品，注解似乎以初學者為對象，或成於李善之前。岡村教授對注本作出全面解構，是一篇很精彩的考證文章。⁸⁰

1987 年，岡村教授發表了一篇有關李善注版本的論

77 岡村繁：《文選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99 年），365 頁。

78 岡村繁著，陸曉光譯：《文選之研究》（《岡村繁全集》第 2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422 頁。

79 神田喜一郎解說：《敦煌本文選注》（東京：永青文庫，1965 年），28 頁。

80 岡村繁：細川家永 文庫藏『敦煌本文選注』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學》第 14 號（1965 年），頁 1-26，收入氏著：《文選の研究》第四章，頁 129-159，中譯本見陸曉光譯：日本細川家永青文庫藏《敦煌本文選注》——唐代初期《文選》注解的側影，《文選之研究》，頁 144-181；岡村繁：『敦煌本文選注』校釈，《東北大 教養部紀要（人文科 篇）》第 4 號（1966 年），頁 194-249；岡村繁：永 文庫藏敦煌本『文選注』箋訂，連載於《久留米大 文 部紀要》第 3 號（1993 年），頁 53-86，及第 11 號（1997 年），頁 15-64，收入《文選の研究》第五章，題為「永 文庫藏『敦煌本文選注』箋訂」，頁 161-289，中譯本有兩種，分別見陸曉光譯：《文選之研究》第五章，頁 182-316；及羅國威譯：永青文庫藏敦煌本《文選注》箋訂，連載於《學術集林》第 14 卷（1998 年），頁 133-173，及第 15 卷（1999 年），頁 170-233，另收入羅國威：《敦煌本文選注 箋證》（成都：巴蜀書社，2000 年），頁 75-211。

文，對比《文選注》敦煌寫卷和後來刻本所引緯書的差異。他發現敦煌卷子應該反映李善注的早期面貌，因為流露出注者對緯書的認識有限，但從刻本可見他對這些材料的運用已非常成熟，故可推斷為後期注本。⁸¹

最具爭議的日本《文選》專家當數清水凱夫（Shimizu Yoshio, 1941年生）。這位立命館大學前教授在大中華地區也頗知名，多數論著已譯成中文行世，⁸² 其文選學論文集（日文）則於1999年出版。⁸³

清水教授最惹人爭議的推斷是，蕭統只是《文選》名義上的主編，編纂工作實由劉孝綽（481-539）承擔。他就此寫了大量文章，立論頗為繁複曲折，但主要建基於兩個論點：第一、六朝時期編纂大部頭著作時，慣例是由得力幕僚主持實際編務，像昭明太子這樣的尊者則列名主纂者；清水認為《文選》的情形正屬此類。第二、清水自稱找到劉孝綽因個人理由而選入《文選》的篇章，其中劉峻的《廣絕交論》被視為鐵證。事緣南朝天監八年（509）

81 岡村繁：『文選』李善注の編修過程——その緯書引用の仕方を例として，《東方論集：東方創立四十周年記念》（東京：東方，1987年），頁225-243，收入氏著：《文選の研究》第六章，頁291-310；中譯本分別見，《文選》李善注的編修過程，載趙福海等編：《昭明文選研究論文集》（長春：吉林文史，1988年），頁165-175；及《文選之研究》第六章，頁317-338。

82 清水凱夫著，韓基國譯：《六朝文學論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年），390頁。

83 清水凱夫：《新文選學：『文選』の新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99），521頁。

左右劉峻離開梁都城建康，移居南面的東陽郡（今浙江金華）。前一年著名學者任昉（460-508）於新安郡（郡治在始新縣，位於今浙江淳安縣西北）逝世，劉峻路過新安時遇上任昉的兒子，看到任西華兄弟夏衣冬穿、一貧如洗，乃仿朱穆《絕交論》而廣之，控訴任昉的故舊好友無一對其遺孤施以援手。⁸⁴ 到洽（477-527）是任昉的一位舊交，與劉孝綽共事梁朝，二人都是有名望的學者和詩人，但「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普通六年（525），到洽出任御史中丞，上書劾奏剛遷升廷尉卿的劉孝綽帶寵妾入住新官府，卻把高堂留在舊宅，直言其「攜少姝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⁸⁵ 後世對於這位妾的身分頗有猜測，甚至因蕭衍欲隱其惡而將「少姝」改為「少妹」，令事情更撲朔迷離。據清水教授推測，劉孝綽對到洽深懷怨恨，遂收入《廣絕交論》一文報復。

清水的所謂「新文選學」被幾位中國學者大力抨擊，顧農和屈守元（1913-2001）二人批評尤力。顧農認為《廣絕交論》並非針對到洽一人，而是所有未曾關顧任昉遺孤的生前知交，並指出劉孝綽本人就是任昉的密友。假如劉孝綽旨在借此文暴露到洽的麻木不仁和於道義有虧，那豈不是自暴其短，他自己也難辭其咎。⁸⁶ 屈守元則提出《廣絕交論》的重點並非攻擊到洽，而在於刺世疾時，對於世

84 見李善注引劉璠《梁典》，《文選》，卷五五，頁2365。

85 《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卷三三，頁480-481。

86 顧農：《與清水凱夫先生論文選編者問題》，《齊魯學刊》1993年1期，另收入《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頁492-504。

道艱難得使任昉這樣的人物身後，子女也遭受困厄而深表不滿。確實如此，只要細讀劉峻這篇文章也會同意這種說法。在1995年鄭州召開的第三屆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清水發表了長文試圖駁倒顧氏的批評，文章收入1997年出版的會議論文集。⁸⁷ 屈教授亦在同一研討會上發文，對清水所持論點逐一批駁。⁸⁸

三、歐美「文選學」研究

本文最後一章將簡論歐美的《文選》研究。二十世紀以前，西方漢學界沒有對《文選》作太多研究。最早關注這本選集的西方學者是阿瑟·韋利（Arthur Waley, 1889–1966）。

阿瑟·韋利生於英格蘭肯特郡皇家唐橋井（Royal Tunbridge Wells），本名阿瑟·大偉·施洛斯（Arthur David Schloss），父親在商務部任職，家境殷實。1914年一次大戰爆發，反德情緒高漲，他身為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後裔，遂與家人一同改從母姓。1907年起就讀劍橋大學國王學院，主修西方古典學，後因眼疾輟學。家人希望他從事出口貿易家庭事業，但韋利無意經商，1913年

87 清水凱夫：就《文選》編者問題答顧農先生，載中國選學研究會、鄭州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文選學新論——第三屆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34–50。

88 屈守元：新文選學芻議，載《文選學新論》，頁51–60。

到大英博物館版畫室任職，工作期間開始愛上中日文化與語言。他在大英博物館服務 17 年，主要為館方登錄中國畫藏品。工餘時自學中文，不用多久便能翻譯漢詩。1918 和 1919 年先後出版《漢詩一百七十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和《漢詩增譯》(*More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1923 年出版《悟真寺及其他詩篇》(*The Temple and Other Poems*)，是首本收入賦作翻譯的西方語言著作。1929 年，韋利辭任大英博物館館員，自此不在任何單位供職，專心從事有關中國和日本文學的著述，著作量驚人。《悟真寺》一書收錄韋利英譯（多數為節譯）的先秦、兩漢、魏晉賦，其中只有兩篇出自《文選》，原因是他對這本選集評價甚低。其評語值得全引：

《文選》是昭明太子於公元 520 年左右編成的文學選集，書中很多篇幅留給了四至五世紀的平庸作手。早在十一世紀，蘇東坡便指斥《文選》流露出何等低俗不堪的文學品味。作為巋然獨存的中國古代總集，其編纂工作竟落入這位溫恭但無能的貴族之手，實在令人遺憾。⁸⁹

有意思的是蘇軾對《文選》的批評，竟在首位認真研究《文選》作品的西方學者筆下老調重彈。

⁸⁹ Arthur Waley, *The Temple and Other Poem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3), 147.

大約與韋利嚴厲指摘《文選》同時，俄裔法國漢學家馬古烈（Georges Margouliès, 1902–1972）出版了一本研究和法譯「《文選》賦」的譯文集。馬古烈生於俄羅斯，1919年起主要在法國生活，1972年逝世。他在巴黎國立東方語言學校取得文學博士學位，1926至1939年間於校內任講師。所譯的《文選》作品只有蕭統序、班固兩都賦、陸機文賦和江淹別賦。⁹⁰不過其譯文錯漏百出，奧地利漢學家贊克（Erwin Ritter von Zach, 1872–1942）已有多篇指謬文章，發表於1927年的《通報》（*T'oung Pao*）。⁹¹

贊克生於奧地利，1901至1919年起任職奧匈帝國大使館，先後派駐北京、香港、橫濱和新加坡，長年在中國工作，工餘勤於治學，精通漢、滿、藏文。雖然一度在荷蘭萊頓大學跟隨施列格（Gustav Schlegel, 1840–1903）學習，但其博學似是自學所得。他的首部著作是對翟理斯（Herbert A. Giles）主編《華英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的糾謬，上世紀初在北京印行；⁹²其後將書中

90 Georges Margouliès, *Le "Fou" dans le Wen-siuan: Étude et textes* (Paris: Paul Geuthner, 1926). Pp. 138.

91 Erwin von Zach, "Zu G. Margouliès' Übersetzung des *Liang-tu-fu* des Pan-ku," *T'oung Pao* 25.1–2 (1927): 354–59; Zach, "Zu G. Margouliès' Übersetzung des *Pieh-fu*," *T'oung Pao* 25.1–2 (1927): 359–60; Zach, "Zu G. Margouliès' Übersetzung des *Wen-fu*," *T'oung Pao* 25.1–2 (1927): 360–64.

92 Erwin von Zach, *Lexicographische Beiträge*. 4 vols. (Peking: n.p., 1902–06).

部分內容改寫成博士論文，1909年呈交維也納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1919年奧匈帝國解體，贊克移居巴達維亞（印尼耶加達的殖民時代舊稱），在荷屬東印度為荷蘭大使館效力，1924年辭職，自始將全副心思用於治學；1942年逃難時所乘荷蘭商船遭日軍擊沉，享年69歲。他在晚年專心致志翻譯中國文學，以德文翻譯了幾乎全部庾信、杜甫、韓愈和李白的詩作，並譯出《文選》九成作品。然而，贊克性情暴躁，毫不留情地對其他學者的作品冷嘲熱諷，最終使他無法在有地位的漢學期刊上發表文章。1920年代晚期，他不斷與伯希和（Paul Pelliot）針鋒相對，勢成水火，逼得其時為《通報》主編的伯希和忍無可忍，將之逐出於作者群以外，聲明「贊克先生提出的問題從此將絕跡於《通報》」。⁹³此後他的書評文章幾乎只能在巴達維亞的無名刊物上發表，一部分著作則自費出版，幸而身後他的譯作大都為哈佛燕京學社蒐集和出版。⁹⁴贊克已把《文選》中的九成作品譯成德文，譯文較直白且無注釋，但相

93 “Il ne sera plus question de M. E. von Zach dans le *T'oung Pao*.” Paul Pelliot, “Mélanges: Monsieur E. von Zach,” *T'oung Pao* 26 (1929): 378.

94 Erwin von Zach, *Han Yü's poetische Werke*, ed. James Robert Hightower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 7)(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 393; Zach, *Tu Fu's Gedichte*, ed. James Robert Hightower. 2 vols.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 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 864; Zach, *Die Chinesische Anthologie: Übersetzungen aus dem Wen Hsüan*, ed. Ilse Martin Fang. 2 vols.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 1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1114.

當準確。

在總結本章有關西方文選學的討論前，我再介紹一位西方學者，即業師海陶瑋（James Robert Hightower, 1915–2006）先生。海陶瑋教授 1915 年生於奧克拉荷馬州，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化學系本科畢業，曾遊歷歐洲，嘗試走文學創作之路，回美後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中文。1940 至 43 年留學北京，1946 年於哈佛取得博士學位，1946 至 48 年再次到北京研修，1948 年起留在母校哈佛教授中國文學，直至 1981 年榮休。在美國同代學者中，海陶瑋教授被視為首屈一指的中國文學專家。他的博士論文全面剖析《韓詩外傳》，是中外學術著作中對本專書研究最精湛的論著之一。⁹⁵ 1970 年出版了陶淵明詩全譯全註本，允為傳世之作。⁹⁶ 海陶瑋教授對《文選》有濃厚興趣，曾撰文分析蕭統的《文選序》，並附以精湛譯文。⁹⁷ 他亦是首位譯註《文選》作品的西方學者，譯筆之優美，

95 作者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寫成專著，見 James Robert Hightower, Han Shih Wai Chuan: *Han Ying's Illustrations of the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the Classic of Songs*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1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 368.

96 James Robert Hightower, *The Poetry of T'ao Ch'ie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0). Pp. 270.

97 James Robert Hightower, "The *Wen Hsüan* and Genre Theo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3–4 (1957): 512–33，收入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ed. John Lyman Bishop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142–63；中譯本見詹姆斯·R·海陶瑋著，史慕鴻譯，周發祥校：《文選》與文學理論，《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頁 1117–1130。

考證之縝密，堪稱文史論著典範。⁹⁸

其他西方學者亦有很出色的《文選》作品翻譯，如英國漢學家霍克思（David Hawkes, 1923–2009）曾將全部騷體作品譯成英文。馬瑞志（Richard Burroughs Mather, 1913–2014）、侯思孟（Donald Holzman, 1926年生）、吳德明（Yves Hervouët, 1921–1999）、傅德山（John David Frodsham, 1930–2016）、華滋生（Burton DeWitt Watson, 1925年生）與柯睿（Paul William Kroll，號慕白，1948年生）等漢學家都選譯了重要的《文選》篇章。⁹⁹ 柯睿的譯文清麗可誦，考據滴水不漏，誠為學術翻譯的楷模。我一直從事《文選》的英譯和詳註，多年前譯出全部辭賦作品，已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文選》英譯前三卷。¹⁰⁰ 至今仍然埋首翻譯《文選》詩作，但受制於為數眾多的其他研究項目，無法將全部時間和精力用在這項工作上，希望退休後能廣續前緒，以竟全功。

98 海陶瑋英譯的《文選》作品分別見：James Robert Hightower, “The *Fu* of T’ao Ch’ie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1–2 (1954): 220–25（陶潛 歸去來辭），收入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89–106；Hightower, “Chia Yi’s ‘Owl Fu,’” *Asia Major*, New Series 7.1–2 (1959): 125–30（賈誼 鵬鳥賦）；Hightower,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Parallel Prose,” *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 eds. Søren Egerod and Else Glahn (Copenhagen: Ejnar Munksgaard, 1959), 70–76（孔稚珪 北山移文），收入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118–22；《文選》所收陶潛詩的譯文，參見氏著：*The Poetry of T’ao Ch’ien*。

99 詳見康達維：歐美「文選學」研究概述，《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頁1178–1185。

100 David R. Knechtges, *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3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96).